

1 . 导 言

本书的写作，酝酿已久，至今方能付诸实现。这不仅由于作者的教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繁忙，更因为要对现存人口经济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必须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和分析。有时，还要等待事物发展显现本质的、规律性的变化；例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与人口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考察和分析，无疑就需要假以时日。在导言部分，我们首先对解放以来人口经济研究发展过程作简要的历史回顾，然后论述本书的写作目的和基本思路。

1.1 解放以来人口经济研究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

解放以来人口经济研究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7年是初期探索阶段；1957~1977年是严厉禁锢阶段；1978~1994年是复苏和迅速发展阶段。下文我们按照这三个阶段，对上述人口经济研究的发展过程做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

1.1.1 1949~1957年人口经济研究的初期探索阶段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民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发展，特别是在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后，解决了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根本的改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当时对人口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占统治地位的是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1949）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等著作里所提出的观点。其要点如下：

第一 失业、贫困等“人口问题”是旧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中国历次革命的发生并非由于人口太多，而是因为封建王朝压迫和剥削人民，“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①

第二“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②“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③革命加生产就可以解决一切人口问题。后来的事实说明，这里所提出的实质上是一种“革命决定论”，用革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第三，人口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④，人口多、劳动力多是我国的优势“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⑤诸如就业问题、粮食问题、住宅问题、教育问题等方面的困难。但是，此后“人多是好事”长期成为对待我国人口问题的主流思想。

当时许多人还接受了前苏联流行的两个人口观点，即：人口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人口问题。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主张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就会被看作马尔萨斯主义而受批判。

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生育无计划、人口盲目地自发地增长。1950~1957年间出生率都在30%以上，其中1950~1954年更高达37%，而死亡率则从1949年的20%降至1957年的10.8%；同时，人口增长率由1950年的19%升至1954年的25%，1957年更增至29%。总人口量由1949年的近5.42亿，增至1954年的近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51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51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515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65。479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0

6.03 亿,1957 年更增至近 6.47 亿,^①在八年里增加了近 1.05 亿,即增加了近 1/5。

我国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势必增加经济建设的困难。而且,当时经济建设学习前苏联经验,采取了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也同人口的无计划发展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上述人口和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并且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可以看作是这种人口观点的杰出代表。

马寅初详细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同经济建设的矛盾。他指出:人口太多加深了生产力落后这个主要矛盾,“我们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生产力,高速度地工业化”,为此“就需要大量资金”,资金主要从国民收入中积累而来,但是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②他强调,中国人口问题将出现在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并表现为各种矛盾,主要是:“人口多,资金少”的矛盾,“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③;工业原料、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人口无限增殖将破坏二者之间的适当平衡,“因人口增殖 粮食必须增产 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④影响工业原料供应;人口的过快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不利

袁永熙主编. 中国人口·总论.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1. 84、106、148

马寅初. 新人口论. 原载:人民日报, 1957. 7. 5. 是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马寅初. 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原载大公报, 1957. 5. 9. 见:新人口论. 北京出版社, 1979. 26

马寅初. 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 原载大公报, 1957. 5. 9 见:新人口论. 北京出版社, 1979. 3

马寅初. 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 原载大公报, 1957. 5. 9. 见:新人口论. 北京出版社, 1979. 14

于改进技术装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口增长过多，将降低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压力。

他在列举当时中国人口增长率高达 3% 以上的事实以后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将愈来愈严重，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①。他还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同马尔萨斯主义的节制生育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二者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他的主张是“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②而且他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③同时还可以提倡晚婚。

当时还有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例如吴景超也曾指出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的庞大以及资金的缺乏”的巨大困难。^④他一方面批判自己以往只注意人口消费的一面，忽视其生产的一面，以致受人口决定论的影响，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指出人口过多所造成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矛盾，人口多了，增加了消费，也就会降低了积累；“过高的人口出生率是有碍于积累的迅速增加的。”^⑤而且，“劳动力必须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果”；中国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不平衡的。我们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

马寅初。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原载大公报，1957.5.9。见：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1979.27

马寅初。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1979.6

马寅初。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1979.20~21

吴景超。中国人口问题新论。新建设，1957（3）。见：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86

⑤ 吴景超。中国人口问题新论新建设，1957（3）。见：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89~90

可以把目前存在的劳动力，加以最合理、最经济、最有效的利用。”^①他还正确地看到，随着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国将面临如何消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

实际上，当时一些中国领导人也曾看到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给经济建设所带来的困难，而主张节制生育。例如早在 1956 年周恩来就曾提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以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的主张。^②毛泽东在 1957 年也曾说过：“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③他主持制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也明确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④然而，这些正确的人口思想，不久就被“大跃进”的浪潮所淹没，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人多是好事”的主流思想。

2. 1957~1977 年对人口经济发展科学研究的严厉禁锢阶段

1957 年夏，在整风“鸣放”的高潮中突然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吴景超等人的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以减轻对经济建设的人口压力的主张，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此开始了对人口经济研究严厉禁锢的阶段。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被贴上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标签，受到严厉的批判。但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坚持上述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而且更提高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高度来分析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要搞好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特

吴景超：《中国人口问题新论》，《新建设》，1957（3）。见：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89~90

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147

参见《人民日报》1978 年 7 月 9 日社论。

刘铮，李竞能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506

别是经济和财政、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的平衡，不仅要搞好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而且要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要抓人口质量。“计划经济的目的是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提高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但中国人口如此之多，而生育率又如此之高，要加速工业化，不很容易^①。实际上，在他看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已经是实现计划经济综合平衡和实现工业化以至社会主义生产基本目的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然而，马寅初是在“大跃进”的年代一再重申自己的人口观点，当时已把阶级斗争（而非发展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他继续受到猛烈围攻就毫不足怪了。概括起来，在批判马寅初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主流人口思想，其要点如下：

第一，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产生人口问题，把强调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严重人口问题的观点，都批判为反社会主义的和反对“大跃进”与“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甚至把主张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观点也说成是反对“大跃进”的反动理论，把马寅初有关“团团转”的平衡理论，等同于马歇尔的均衡理论来加以批判。

第二 把“人多是好事”引申为“人口越多越好”的观点，甚至说中国人口多是威力最大的原子弹、氢弹。在另一方面，则把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一律批判为马尔萨斯主义，“人口决定论”。

第三 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出了“人手论”，宣称人人都有两只手可以从事生产，而且生产先于消费，生产必然有剩余，不仅够自己消费，还可以供别人消费，所以“革命加生产”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理论是以所谓“土

^① 马寅初.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财政出版社, 1958. 见: 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 增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615

地报酬递减规律”为基础的，而这种“规律”已为“大跃进”的事实所粉碎。

可是，“大跃进”运动终于以 1959~1961 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停滞、衰退而告终。面对这样的事实，许多坚持主流人口思想的学者仍然否认中国过分庞大的人口对经济建设所造成的压力，否认在错误的人口经济思想支配下所出现的政策失误，而归因于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于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人口经济研究便成了禁区。

1964 年全面开展的“四清运动”和 1966 年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阶级斗争”越演越烈，科学的人口经济研究已处于停顿状态。虽然，从 1964 年开始已逐渐设立实行计划生育的机构，但人口增长事实上仍基本处于自发状态。1964 年中国人口已突破 7 亿，达 7.05 亿；1969 年便突破 8 亿，达 8.07 亿；1974 年更突破 9 亿，达 9.09 亿；每增 1 亿人口的时间已由 10 年缩短至 5 年^①。这种人口增长迅猛的趋势不能不使有识之士深为忧虑。而早在 1976 年便有人开始研究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相互关系了。

3. 1978~1994 年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复苏和迅速发展阶段

根据史实可以把 1978~1983 年称为人口经济研究的复苏阶段。如上所述，早在 1976 年已经有一些学者探讨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相互关系，但是直到 1978 年以前，他们的观点仍未摆脱以往主流人口思想的束缚。而且，后来在人口学界引起热烈争论的“两种生产理论”，也是在 1978 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才广泛流传的。

在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有三件事可以说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复苏的催化剂。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为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

在复苏阶段，中国人口经济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和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可能出现人口问题，甚至是严重的人口问题，产生人口问题的根源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认为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说是经济发展问题。同时认为，人口不断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人口规律，进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规律。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规律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按比例有计划发展规律的支配，从本质上说，要求人口和经济按比例有计划地发展，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

第二，探索人口和经济、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人口再生产必须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相适应的“两种生产理论”。围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序言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有关论点，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绝大多数人口学者承认“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的基石，并探讨了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的比例关系和国民经济基本比例关系的联系问题，二者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律问题，等等。当时，人口学界最关注的是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说来是人口过多、增长过快对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两种生产理论”为强调要注意这种负面影响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并同“人口决定论”划清了理论界线，从而为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提供了科学根据。在讨论中，不少学者以中国经

济建设的大量事实说明，当时存在的许多人口经济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在思想和政策上放任人口盲目发展，以致和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并存在严重矛盾的结果，必须“两种生产一齐抓”，实行计划生育以适应计划经济的发展。

第三，在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等主张实行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平反时，力求划清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同马尔萨斯主义的节制生育的本质区别，阐明了有关人口发展的许多基本观点。人口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既有自然属性，更有社会属性；人口发展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但是它既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又有其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口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体，人口发展不仅是数量的发展变化，也是其质量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运动过程。人口又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体，作为消费者的人口必须与消费资料生产相适应，而作为生产者的人口必须用生产资料和技术装备起来，同生产资料生产相适应，并且有一定劳动年龄的限制。单纯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考虑人口问题的“人手论”和单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的“人口论”，都是片面的，都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带来消极的影响。

第四，开始引进西方现代的人口分析方法，研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其他大型调查，所得到的高质量的人口数据，分析和阐明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趋势和特点，以及它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通过对大量人口经济资料的分析，说明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属于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的再生产类型，人口增长的潜能和惯性很大，如不尽快实行计划生育，降低出生率和生育水平，经济建设必将继续面对沉重的人口压力而难以迅速发展。有的学者还根据我国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的情况和趋势，探讨中国人口最优规模问题。这些人口研究成果，都为制定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力的依据。

为了推进人口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在当时大量人口经济研究的基础上，在 80 年代初开始编写人口经济学的大学教材，在 1983

年出版了由张纯元等人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揭开了我国人口经济学系统研究的新的一页。

1983~1994年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迅速发展并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经济学奠立基础的十年。它的开端就是上述《人口经济学》的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人口经济学教科书。其最大特征可以说是完全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力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没有借鉴西方人口经济学教材的模式。

它首先阐述了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经济的基本理论，然后论述人口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着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再生产过程中人口和经济的各个主要方面，特别是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人口和环境与资源，以及人口分布、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了国内外存在的主要人口经济问题。针对当时中国人口经济状况，它在分析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时，偏重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偏重于宏观人口经济分析，而未以专门的篇章来考察生育经济学，对微观人口经济分析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它大胆地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概念：人口经济关系、人口经济过程、人口经济规律、人口经济效益，以此建立人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它以人口经济效益为核心去分析和衡量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力图在这个基础上对“过剩人口”和“最优人口”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它还以宏观人口投资和家庭人口投资的分析，探讨人口变动对经济技术发展的作用，它开拓了人口经济研究的许多新领域，迄今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其后还出版了一些人口经济学教材^②，它们各自设计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各有特色。但是它们同上述《人口经济学》一样，具

张纯元等主编。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例如吴忠观编著。人口经济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张文贤著。人口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李树蔚主编。人口经济学概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有类似的缺陷，即偏重于推理而缺乏实证研究科学成果作为论据，此外对当今西方人口经济研究的优秀成果的批判和借鉴工作也只是起步。这无疑限制了这些著作的成熟程度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应当指出，实证研究特别是大型调查研究，以及对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评介和借鉴，正是这个时期人口经济研究两个比较突出的发展趋势，并促进了它在中国的迅速发展。

在评介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方面，这个时期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在培养人口经济学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时开设了有关当代西人口经济学的课程，有的研究机构在联合国的资助下举办了有关讲座或研讨班，重要的如北京大学先后举办的微观和宏观人口经济学讲座，由列宾斯坦等著名人口经济学者主讲。第二，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评介西方人口经济学的书，比较流行的如 1984 年出版的朱利安·西蒙的《人口增长经济学》中译本和 1987 年出版的彭松建著的《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等。第三，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也做了大量的评介工作，而且往往是结合分析中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

在实证研究方面，这个时期更是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首先是开展了大型的专题调查研究，如：对 36 个小镇所做的“小城镇人口发展与迁移人口”调查（1987~1989 年）^①；老年人口经济状况调查（1987~1990 年）^②；对 74 个城镇所做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调查（1987~1990 年）^③；“人口城市化模式和发展道路”不同地区调查（1987~1990 年）^④；23 个贫困县人口经济情况调查（1990~1993 年）^⑤；“家庭经济和生育率变动”调

刘铮主持，九个人口研究机构参加，IDRC 资助项目。

田雪原主持，12 个省市的研究机构参加，联合国人口基金 P50 项目。

马侠主持，12 个省市的研究机构参加，联合国人口基金 P50 项目；“七·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李竞能主持，11 个研究机构参加，“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张纯元主持，23 个研究机构参加，联合国人口基金 P04 项目。

查(1990~1993年)^①，等等。这些调查所得大量数据，大都运用电脑等现代化手段加以处理和分析，其结果的准确度和可信度是以往人口经济调查所不能比拟的。

在这个时期还开展了大量人口经济专题研究，除上述各项外，重要的还有：妇女参加社会经济活动问题研究，生活质量及其指标体系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情况研究，城市化与非农化研究，贫困问题和乡村综合治理研究，老年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人口与环境特别是土地承载力问题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填补了我国人口经济研究的许多空白，使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尤其可贵的是，已经有一些研究单位选择一些社区作为人口经济研究的试验点，其工作已不限于调查研究，而且制定具体措施和实施方案，和当地政府部门合作改进社区的经济、文化、思想状况，以促进经济繁荣和人口转变。

回顾解放以来人口经济研究的历程，特别是考察它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第一，必须尊重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实际出发而不能盲从于某些人的主观意志去开展研究，换言之，必须尊重人口经济研究的科学性与独立性。第二，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为此必须掌握大量实际调查研究资料，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和方法进行系统分析。第三，理论建设和实际效益并重，既重视其科学性、理论性，又重视其对策性、实用性，把理论放到解决实际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践中去检验。第四，必须不断吸收世界先进的人口经济科研成果，大胆借鉴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说和方法中的科学成份，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以加速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作上述简要的历史回顾，是为了更好地探索中国人口经济研究今后的发展道路。

田雪原主持，十多个研究机构参加，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

2 本书写作目的和基本思路

众所周知，在 90 年代初，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是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发展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①换言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模式，将从指令性计划经济转轨到现代市场经济。这种巨大变化不仅会影响社会经济建设的进程，而且必将影响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以往在论述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时，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物质生产的有计划发展要求人的生育也要有计划地发展，要实行计划生育来和计划经济相适应，人口和经济才能协调地发展。现在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模式要由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似乎使实行计划生育的社会经济基础失落了。虽然这只是某些人的一种错觉，但是也表明，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关系在许多方面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事实上，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开端已经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或者说，人口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特征。因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和分析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发展的问题、特点和趋势，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了。

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理论，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以后人口经济发展的状况、特点、问题和趋势，从而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经济学做力所能及的基础性工作。应当说明，本书虽然从分析我国现存的人口经济问题出发，但是以人口经济学的理论建设为主要落脚点。因此，本书虽然实际问题分

引自 迈向 21 世纪的行动纲领。新华出版社，1992. 10

析和理论观点分析并重，但在处理上往往更偏重于理论观点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更确切的题目应当是《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

通过本书的写作，力图将作者多年来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心得及分析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所获得的科学成果，加以整理、综合、概括和提炼，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特点、发展趋势以及解决的主要途径。以此奉献给关心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考，也可以作为人口经济学研究生的参考书，也许还能对决策者解决有关人口经济问题提供一定的科学论据。

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主要从以下基本观点出发：

第一，必须从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的角度，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对待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往在分析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时，一方面强调人口发展以一定的社会经济为基础，并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反对把人口看作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肯定人口对经济发展会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但是，人们往往在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把人口问题作为替罪羊，而在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时忽视人口问题的重要作用，甚至有时认为经济增长上去了，人口增长自然降下来，人口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在上述观点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首先考虑人口因素的作用，考虑如何实现人口和经济相互关系的良性运行。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虽然大多数人承认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他们大都偏重于人口数量而忽视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们往往只就人口问题谈人口，未能密切联系社会经济发展来树立大人口观念。

还应当指出，人口和经济之间不仅存在外部联系，而且存在内在联系，劳动力是这种内在联系的纽带。但不少人只把人口看作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因因素而非内因因素，未把人口在社会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放到重要的位置上，甚至缺乏人均意识。事实上，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最能显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效益，也正是人口和经济存在内在联系的一种反映。不少人在口头上承认人口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事实上未把人口看作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往往未能认清在人口因素影响下经济增长的真实程度。真正的经济增长 G 至少应当是：国民收入的增长（ Y ），在扣除了人口增长（ $P_1 - P_0$ ）下为维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 N ）以后的净增长，换言之 $G = Y - N(P_1 - P_0)$ ；边际人口越大，它对经济增长的减损量也越大。

不仅这样，在分析人口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时，还应当从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考虑，不但为一代人的幸福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着想。不但应当考虑人口和经济、人口和物质生产的关系，还应当考虑人口和资源、环境及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此外，由于世界经济发展既多元化又日益具有全球化（Gobalization）的趋势，因此考察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时，不仅要从本地区、本国的利益出发，还要有全球战略眼光。社会主义经济目标模式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以后更应当如此。

第二，应当从人口是“两种生产”活动的主体的角度，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对待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相互关系。人口不仅是自身再生产的主体，同时也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主体。在物质资料再生产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而在生产力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要靠劳动力去创造和运用。如果忘记了人口在“两种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容易陷入理论或实践的歧途和误区。

以往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虽然已经看到二者必须互相适应的规律性，但实际上往往着重强调人口再生产必须服从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客观要求。以往虽然已经指出“两种生产”具有不同特性，人口再生产既受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制约，又有其相对

独立性，但实际上往往只要求强制人口再生产接受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制约，甚至把人的再生产按物的再生产来对待，忽视了人口在“两种生产”中的主体地位。

应当指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实现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协调发展，而它的关键是明确人口在两种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育龄人群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现阶段，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目标模式转轨到市场经济以后，更应当遵循上述原则，因为市场经济在运行上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承认经济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具有完全独立的经营自主权。与此同时，还应当避免把两种生产的相互关系简单化的倾向，而应当深入地系统地研究二者之间各种主要的内在联系，特别是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总人口和消费资料生产、劳动力人口和生产资料生产以及相应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第三，应当从搞好社区建设和综合发展的角度，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人口和社区发展的相互关系。社区不同于地区，它是一个以一定地域一定人口为基础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单纯的地域概念。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它具有共同的社会意识和物质利益，有比较密切的社会交往，因此具有较强的内在凝聚力。社区生活一般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习俗等各个社会领域，社区人口则是该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体现了这一特定人口的共同利益，并和相应的人口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深入研究人口和社区发展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特定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正因为这样，社区研究已成为当前人口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

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不同区域之间特别是沿海地区和内陆边远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社区研究更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对具有典型性的基层社区如村、乡、镇等进行专题研究，也是深入剖析特定时地的人口经济问题，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经济发展趋

势，总结有关的经验教训的行之有效的好方法。近年来我国不少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发展经济的好经验，特别是少生快富奔小康和建立文明幸福家庭的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社区研究带动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而创造出来的。

社区经济可以说是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之间的一个连接点或中间环节。如果说，对人口因素和国民经济（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宏观人口经济研究，对人口因素和家庭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微观人口经济研究，那末对人口因素和社区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可以称为中观人口经济研究。宏观人口经济研究着重于总量分析，着重于总的发展趋势等全局性问题。微观人口经济研究着重于个案分析和具有典型性的问题，其作用相当于解剖细胞。而中观人口经济研究着重于专题分析，通过社区研究，上溯全局发展趋势和特点，下据个案典型剖析，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具体地反映带全局性的问题，又可把典型经验由点到面地加以研究和推广，其重要性已经日益为人们所认识。

第四，研究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时，还应当重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我国人口研究对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还是重视的，但是在分析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时往往只考察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或者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的直接影响，无形中排除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有时会起中介因素的作用。这样，很容易使人口经济分析简单化。事实上，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又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甚至互相溶合而难以净化的，因此必须对人口经济发展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

从研究方法来看，为了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在分析人口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时，必须首先有一个由复杂的具体现象到简单的抽象本质的分析过程，把非经济因素抽象掉；可是一旦掌